

“想种却不敢种”

种植高价值经济作物风险大贷款难缺技术，农民存顾虑

■编者按

日前，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指明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和底线。提出要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变化，以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优化农业产品结构、区域布局、经营体系等；同时，确保粮食生产能力不降低、农民增收势头不逆转、农村稳定不出问题。本报记者赴济宁、聊城等地，深入田间地头采访，带来这组“农民眼中的供给侧改革”报道，听听农民在想什么、干什么、盼什么。



农民眼中的供给侧改革(上)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刘长春 胡克潜

这几天天冷雾大，济宁市汶上县次丘镇三楼村的种粮大户刘宪礼，一天三趟往他的圆葱地里跑，生怕冻坏了幼苗。刘宪礼包了1100亩地，他特意挑选了70亩好地种圆葱，试图调整种植结构，跳出“一麦一棒”的循环。尽管圆葱占包地面积的比例很小，可他对此格外上心。像刘宪礼这样，在土地流转基础上，汶上县很多种植大户开始减少小麦、玉米面积，尝试种植高价值经济作物，但因风险大，只能在小范围内“小打小闹”。由于市场风险不可控、融资贷款渠道不畅通、种植管理缺乏技术等原因，很多农民在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中表现出“想碰却不敢碰”的心理。

“一麦一棒”模式开始改变

2016年12月29日一早，三楼村的麦田里薄雾氤氲。刘宪礼开着用种粮收入购买的奥迪A6轿车来到了他的麦地里。他说，地里湿度大，小麦好越冬，明年丰收不成问题。刘宪礼的效益来自土地流转基础上的适度规模种植。揽着从村内、村外包来的1100亩地，即便是“一麦一棒”一年一年地往复，因为种植规模大，粮食价格相对稳定，他平均每年的收入也有30万元左右。如今，虽然已经种上了70亩圆葱，但他表示经济作物虽然价高，但风险大，还是不敢多种。三楼村党支部书记胡克华说，村里共1230亩耕地，大部分已经流转了，但土地到了刘宪礼这样的种植大户手里，大多还是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

比起三楼村，汶上县郭屯镇美化村虽然起步晚，但他们进行土地流转伊始就向着“无粮村”发展。去年，占全村耕地总面积87.5%的1400亩地流转起来以后，全部和小麦、玉米“说了再见”。改种的高价值经济作物中，有200多亩菠菜、300多亩大蒜、600多亩牛蒡，还有200多亩生姜和药材。将土地流转出去以后，不少村民外出打工。美化村党支部书记崔秀爱说，比起原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死磕”，现在普通村民人均收入增加了一倍。与此同时，大量土地集中到了少数的大户手里。



目前，汶上县郭屯镇美化村村崔全枝地里的菠菜长势不错。(□吕光社 王浩奇 报道)

“第一年种，真没想到收成会这么好。”村民崔文习包了120亩地，用其中的30亩种了地瓜，亩产超过7000斤，扣去种植成本，每亩地瓜纯收入达1300多元。在此之前，他在村里包地已经五六年了，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像去年这样改种经济作物还是第一次。“先把土地流转出来，至于种什么，自然会有市场来调节。”郭屯镇党委书记刘宝成说，全镇农业主导产品并不突出，但只要大家想改变“一麦一棒”种植模式，时间长了，哪个挣钱老百姓自然就会种哪个。目前，全镇4.8万亩耕地已经流转2.4万亩，其中有1.6万亩种植经济作物。他们计划用3到4年的时间，将全镇的土地都流转出来种经济作物。

风险大贷款难缺技术

这几年粮食价格下跌，“一麦一棒”丰产不丰收，农民常常忙活一整年，却收入微薄。去年，在村里的鼓励下，崔文习狠了狠心将120亩地全种了经济作物，除了地瓜，还有80亩白芷和10亩土豆。虽然种上了值钱的东西，他却总感觉心里没底。原来早在2014年，崔文习曾尝试种了15亩地的高粱，可收获后价格一直走低，迟迟不见往年收高粱的商贩到村里来。后来，他只好将既干净又饱满的高粱低价卖给了附近的一家酒厂。付款时，酒厂还以高出市场价格两倍的酒抵了3000元的高粱钱。崔文习很是无奈，最后赔了7000多元。

“想种却不敢种。”崔文习说，一来，高价值经济作物本来就“娇贵”，没有技术，又不会管理，种粮食的老把式并不一定能种好经济作物；二来，即便是种好了，万一碰上“好货没有好行市”，亏损起来农民承受不起。和崔文习同村的崔全枝，去年更是体验了一把经济作物价格起伏的“过山车”。他与朋友合伙在村里包了300亩地种牛蒡，收获前期，价格却跌到了每斤0.3元。而牛蒡种植成本高，光收获的成本每亩地就需要1000元。同时，牛蒡地的流转价格每亩也要比一般土地高出五六百元。要按这个价格出手，300亩牛蒡至少要赔60万元。崔全枝急得火急火燎，更没想到的是合作伙伴也找不到人了。如此一来，他不仅面临赔本，连一年的承包费也没有着落了。

好在，崔全枝最终有惊无险。一时不知所措的他，找到了村里成立不久的济宁北园社区蔬菜种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蔬菜种植公司”)。蔬菜种植公司帮崔全枝联系了临沂的一位储存商，对方答应出钱收牛蒡，并帮他付来年承包费，牛蒡出手后双方分利。现在，牛蒡价格涨到了1.7元一斤，300多亩的牛蒡能净赚100多万元。想要转变种植结构的农民，还面临贷款难。种植大户承包土地，一般需要预付给农民承包费用，自己没钱周转，金融机构又贷款要求高、放款不及时，这也是制约大户发展的一个大瓶颈。“现在农民贷款太难了，必须得找‘吃财政的人’作担保，而且担保夫妻双方都得签字，才能贷下来。”三楼村村民胡向全一直就想扩大规模，调整结构，可总是突破不了贷款这道关。“我一个农民去哪儿找‘吃财政的人’去？”胡向全不甘心，去年秋季他找到了农商行联系村里的办事员，想通过“五户联保”的方式贷款，没想到对方一句“没接到行里这方面的规定，办不了”，就把他打发了。另外，农民种粮的老把式并不一定适合高价值经济作物，种植结构调整过程中的管理、技术短板是大户面临的另一困难。

调整种植结构，政府该做什么

风险大、贷款难、缺技术，为了解除种植大户的后顾之忧，当地政府也在努力。汶上县从2014年开始对所有乡镇安排农技人员进行包保，通过举办培训班、田间地头指导等方式对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进行技术指导，促进农业生产降本增效。“大户看市场需求种地，我们看大户的需求服务。”汶上县农业局副局长陈建强说，去年举办的培训班中，有两场的主题就是农产品供需和市场风险控制。通过努力，2016年相比2015年，汶上县小麦面积减少了4.8万亩，玉米减少了6.8万亩，同时大豆增加了2.1万亩，杂粮增加了0.3万亩，露地瓜果增加了5.95万亩。与此同时，当地探索农企共建，鼓励社会化服务公司为种粮大户服务。落户郭屯镇不久的济宁大粮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粮服务公司”)充当了第三方的角色，为种粮大户减轻了负担。大粮服务公司为种粮大户打造“订单农业”，种植时与大户签订订购协议，统一提供种子、农药、化肥，生产过程中进行全程技术指导。与此同时，还帮助大户进行针对性的贷款。大粮服务公司和京东合作为农户提供“京东贷”，包括生产资料贷款、生产贷款、租地贷款。贷款以大粮服务公司作为担保，不光手续简单，跑腿少，办理时间也很快。

快递员、环卫工等户外工作者暴露在污染中，专家表示——

雾霾下劳保政策待完善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张春晓 李振

元旦以来，雾霾一直笼罩省城。雾霾之下，很多户外劳动者依然坚守在岗位上。1月5日上午8点多，申通、圆通、韵达、顺丰等快递员陆续到达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学生宿舍区，将快递扫码分类，摆在路边。“我们靠收件赚钱，雾霾一大，大家不愿意出来，收件就少。”快递员张鹏威告诉记者，“雾霾天气能见度低，派送员在途中耽误时间，被投诉的话就会罚款；还有些物流车在高速路上堵着，早上的派送件少了几十个。”“今天早上，我下楼一看，雾霾这么大，就上楼拿了个口罩，但还是没戴。”张鹏威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个黑色口罩，他表示不习惯戴口罩，和别人讲话说不清。当被问到是否担心身体健康时，张鹏威说：“只担心快递送不完，今天送不完，又要堆到明天。”记者随后走访了多家快递公司，只有一小部分公司为员工配发了防霾口罩，而很多公司没有提供任何防护设备和补助。



雾霾下的生活

(□记者 李振 方全 张依盟 报道)



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目前，从国家到省里，只有高温天气劳动保护相关规定，对于雾霾以及极度低温等天气下的劳动保护，并无相关规定。正是因为缺乏相关规定，更需要企业有人文关怀的自觉。山东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韩球认为，应解决快递员、环卫工、建筑工等户外工作者社会保险缺失的现状，特别是提高工伤保险覆盖率。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张百灵认为，用人单位应为员工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同时，户外劳动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也要加强。连续雾霾天气使得呼吸系统疾病进入高发期。记者走访省城多家医院呼吸科门诊发现，上呼吸道感染、慢性呼吸道疾病急性加重的患者显著增加。在济南市儿童医院呼吸科门诊，候诊患者将座椅挤得满满当当，小患者们个个戴着口罩，咳嗽声此起彼伏。据了解，该院呼吸科门诊平时月接诊患者在2500人次左右，自去年11月雾霾加重后增加到3000人次左右。“雾霾严重时减少外出时间，特别是老人、儿童以及有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者更要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少去人多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场所，避免呼吸系统疾病交叉感染。”济南市儿童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丁明杰提醒。专家提醒，对付雾霾，口罩、空气净化器防霾工具用起来。N95口罩是较为常见的防霾口罩，在购买时要选择正规企业生产的。在室内要及时开启空气净化器，减少烹饪、吸烟等导致室内空气质量下降的活动，污染天气尽量少开窗。

记者随聊城、济宁环保工作人员进行大气污染防治检查

“现在重点放在了乡镇”

□ 本报记者 王兆峰 杨秀萍 吕光社 张誉耀

雾，冷雨，路湿滑。1月5日上午9时许，聊城市环保局污染事故处理中心党支部书记柴洪峰和同事赵冬辰、魏国栋，驱车去临清市烟店镇，进行大气污染防治检查，本报记者一路同行。柴洪峰说：“这段时间，环保局天天下去督促检查，城区管理比较规范了，现在重点放在了乡镇。”烟店镇郑厂馒头加工厂，属于当地较大的馒头加工厂，已于上月29日停产。厂长郑殿云对关停馒头厂表示理解，也盼望能尽快重新开张。郑殿云说：“现在大气污染这么厉害，咱农村也有雾霾了，政府让停产，咱得支持配合。我已订购了新设备，能烧清洁型煤，争取早日重新开张。停产一天少收入3000多元，时间长了真撑不住。”

柴洪峰与烟店镇镇长刘天军等当地干部商量着怎么帮助郑殿云尽快恢复生产。山东省宇捷轴承制造有限公司也于上月29日停产。公司总经理蔡梅贵说：“一天损失5万元。治理大气污染是大家的事儿，再有困难也要克服。”刘天军对柴洪峰说：“我到任20多天，天天和大气污染作斗争。多家轴承企业停产，有些企业有国外订单，生产不出产品，要赔国外客户违约金，企业家叫苦不迭。但他们都能顾全大局，按要求停产了。其实，每个人都受雾霾之害。”随后，又走访了几家企业和建筑工地。大家忙到1点多才吃午饭，随后又赶往临清市驻地。路上，雾又大了。同一天，济宁淅淅沥沥的冬雨并未冲散连续几日的雾霾，上午9点30分，记者跟随济宁市重污染天气应急督查第六督查组赶赴郓城，进行随机抽查。

第一站，督查组来到华电国际邹县电厂，在大门口，督查员刘继凯亮出环保督查证件，门卫放行。随后督查组直接来到位于Ⅲ期汽机房中部的集控室，这里可以实时调度查看全厂生产情况。目前，该电厂1-4号机组都已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正常运行，5、6号机组正在进行停机改造，因此，刘继凯重点查看了7号机组的生产负荷、二氧化硫排放浓度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三项指标，均符合应急响应措施的要求，减产超过标准生产功率的60%。第二站，督查组来到邹城中联混凝土有限公司，整个公司静悄悄的，生产区下料口已经十分干燥，显示已经停止生产多日，近20辆混凝土车辆停在院子里。接二连三督查完四个地方，督查组返回济宁市环保局时，已经夜幕降临。

财政部回应 企业税负问题

我国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税率 属中等水平

作为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营改增试点全面实施已经半年多。聚焦当前，如何看待企业税负问题？5日，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回应企业税负问题。

税改体现普遍性减税 和结构性减税相结合导向

问：最近有媒体报道，有企业反映当前我国的税收制度不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对此有何评论？答：我们注意到了媒体的有关报道。关于现行税制是否不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们可以从近十年中国税制改革的进程作些分析和判断。这里我们先回顾一下目前约占我国税收收入60%的两个主要税种，即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改革过程的政策导向。2008年，我国对企业所得税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取消内外资企业差别待遇，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二是法定税率由33%降为25%，如果进行国际比较，这一税率属于中等水平；三是将原来以区域优惠为主的税收优惠体系转变为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四是对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和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分别给予15%和20%低税率优惠；五是对西部地区鼓励类企业执行15%低税率优惠。从以上改革措施不难看出，企业所得税改革，是按减轻企业税负设计，同时也重点支持了高新技术企业和西部地区企业的发展。

2009年，在全国范围实施了增值税转型改革，企业购进机器设备支付的增值税可以抵扣，当年减税1416亿元；2012年开始在上海实行交通运输业、以及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等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当年减税426亿元，其中包括其它非试点地区企业购进试点地区企业服务增加进项抵扣少缴的税额；2014年营改增试点行业范围扩大到全国“3+7”个行业，即交通运输业、邮政业、电信业3个大类行业，以及研发和技术、信息技术等7个现代服务业，当年减税1918亿元；2016年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企业购进服务、不动产等支付的增值税都可以抵扣，当年减税超过5000亿元。从税率来看，我国增值税的标准税率为17%，在世界上160多个实施增值税的国家和地区属于中间水平，同时还设置了13%、11%、6%三档低税率。总的看，近十年来我国涉及企业的两大主要税种的税制改革，体现了普遍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相结合的政策导向，是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放水养鱼”意识，在落实好现有的减税降费政策的同时，着力完善税制，研究新的减税降费措施，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严查乱收费，加强社会监督

问：有企业反映一年缴纳几百项收费，请问对清理规范涉企收费有何考虑？答：我们听到了企业的反映，已请有关地方财政部门进行调查，如果有乱收费行为，将严肃处理。近些年，在推进税制改革、减轻企业税收负担的同时，我们始终重视涉企收费管理问题。本届政府成立以来，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措施，目前保留的中央级政府性基金减少到23项，中央级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少到92项，其中，涉企收费68项。各地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也大大减少。当然，涉企收费问题比较复杂，除了行政事业性收费外，还有中介服务收费、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等经营服务性收费。下一步，我们将与有关部门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再取消、调整和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在财政部门门户网站公开中央和地方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揭秘APP传销骗局 蒙阴破获传销大案

涉32省份51万余人金额1.4亿元

□记者 王洪涛 报道 本报蒙阴讯 日前，国家工商总局向社会发布了7起参与人员众多、涉及地域广泛、涉案金额巨大、有一定影响力和代表性的网络传销典型案例。其中，山东蒙阴“南京国通”案涉及全国32个省份，涉案人员51万人，查清涉案金额1.4亿元，上缴国库罚没款金额5083万元。2015年9月4日，蒙阴县工商局公平交易局接到受害群众书面举报：南京某通讯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网络开展网络电话业务，吸收会员，会员从发展下线中获得主要收益，有传销嫌疑。经查，该公司从2014年6月24日起，在销售其研发的APP即时通讯客户端软件过程中，利用其开设的“苍生仙子”(2015年7月至2015年9月26日改名为“苍生电子”)网站进行经营发展会员。采取注册制发展下线，收取200元、1000元、5000元、10000元不等的入门费后，交费者即可成为文字版、语音版、视频版、商城版APP客户端4个不同类型会员(A级)，同时可以向下发展会员(B级)。通过五级提成制度，A级能够领取B级购买客户端总额的28%作为奖励。B级可以发展C级会员，A级能够领取C级购买客户端总额的5%作为奖励，直至领取到E级会员的交费提成，激励会员大力发展下线。同时，该公司另有直接销售奖、小市场补助、报单奖、年终分红等奖励模式。该公司采取的经营模式和报酬方式是通过发展会员加入，要求被加入人员认购APP即时通讯客户端，取得加入和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同时发展下线形成两个市场，并以市场内会员的业绩计算并给付上线报酬，谋取非法利益。其行为违反了《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二)项和第(三)项之规定，构成组织策划传销行为。